

說吧， 記憶

「美國」納博科夫 著
楊 青 譯



花城出版社

說吧，記憶

[美國] 納博科夫 著

楊 青 譯

粤新登字05号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G.P.PUTNAM'S SONS, New York, 1966
根据纽约帕特南书局 1966年版译出

说吧，记忆

〔美〕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 著
杨 青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番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插页 199,000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册

ISBN 7-5360-0991 7/I·887

定价：5.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渊博，有趣，真实而又充满幻想的书。

它是美籍俄裔著名作家纳博科夫的一部回忆录。围绕一生37年（1903——1940）的经历，作者描画了一条色彩斑驳的道路：生命中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早期教育，频繁的国外旅行，对蝴蝶的酷爱和捕猎，写诗，结交女友，十月革命，在国外的生涯。尽管回忆的是个人身世，但在时间和空间上所涉甚广，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各个方面，而最终归结为对时间的沉思。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之处，在于作者无意作纯客观的记述，而是以知识和想像对现实实行改造，使之变成一个诗一般的艺术世界。

本书的形式和语言风格卓具特色。全书布局奇诡，构思巧妙，恍如一道精心安排的象棋难题。行文流利，跌宕，曲折，充满隐喻，有如迷宫，令人在期待，迷惑和惊奇中，不时获得了悟的快感。

给薇拉

目 录

前言.....	1
一.....	8
二.....	20
三.....	36
四.....	62
五.....	76
六.....	99
七.....	119
八.....	131
九.....	149
十.....	167
十一.....	185
十二.....	197
十三.....	217
十四.....	235
十五.....	251

前 言

本书是个人回忆的一个有系统联系的集合，它在地理上从圣彼得堡延伸到圣纳泽尔，覆盖37个年头，从1903年8月到1940年5月，只有不多的一点突进到以后的时空。引发了这一系列的那篇文章对应于现在的第五章。30年前在巴黎，我以“Mademoiselle O”^①为题用法语写下了它，让·保朗把它发表在1936年的Mesures^②第二期上。一张照片（最近发表在季赛勒·福鲁恩的《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中）纪念了这件事，只是我被误指为（在围着一张花园石桌休息的 Mesures 同仁中间）“奥迪贝尔蒂”了。

在我于1940年5月28日移居前往的美国，“Mademoiselle O”由已故的希尔达·沃德译成英语，由我修订，又由艾德华·威克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它也是印行我在美国写的小说的第一本杂志）1943年1月号上。我与《纽约人》的合作是（通过爱德蒙·威尔森）以1942年4月的一首短诗开始的，继而是几篇即兴作品，但我的第一篇散文创作只是在1948年3月才出现在那里，这就是《我舅父的画像》（全书的第三章），1947年1月写于科罗拉多州埃斯蒂斯帕克的科隆比纳洛奇。要不是哈罗尔德·罗斯与我往昔的幽灵如此相投的话，我妻子，孩子和我不会在那里又待了很久的。同一本杂志也发表了第四章（“我的英语教

育”，1948年3月27日），第六章（“蝴蝶”，1948年6月12日），第七章（“科莱特”，1948年1月31日）和第九章（“我的俄语教育”，1948年9月18日），均写于麻州剑桥，在一个精神与肉体面临巨大危机的时期，以及第十章（“卷帘人”，1949年1月1日），第二章（“我母亲的画像”，1949年4月9日），第十二章（“塔玛拉”，1949年12月10日），第八章（“幻灯”，1950年2月11日；H. R的疑问：“纳博科夫家是个只有一把胡桃夹子的家庭吗？”）第一章（“完美的往昔”，1950年4月15日），和第十五章（“公园与花园”，1950年6月17日），均写于纽约伊撒加。

在剩下的三章里，第十一和十四章出现在《党人评论》上（“第一首诗”，1949年9月，和“流亡”，1951年1—2月），而第十三章则给了《港口杂志》（“三一巷的寄宿舍”，1951年1月）。《Mademoiselle O》的英译本再次发表在《九故事》里（新方向，1947），和《纳博科夫十二篇》里（道布尔戴，1958；海涅曼，1959；大众书局，1959；和企鹅丛书，1960）；在最后一个集子中，我还加进了《初恋》，它成了选家的宠物。

尽管我以上述的最先发表日期所反映的古怪次序来写作这些章节，它们一直整齐地存放在我头脑中编了号的缺口里，遵守现在的章节顺序。那顺序在1936年，在放置基石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这块基石在它隐秘的空洞里容纳了各种地图，时间表，收集的火柴盒，一片深红色玻璃，甚至——我现在认识到——我阳台前的日内瓦湖风景，它的涟漪和光耀的空白，如今在饮茶时分，它满布着大鹅和羽毛簇簇的鸭子，像小小的黑点。因此我毫不费力地装配起了一本纽约哈帕兄弟公司在1951年出版的书，书名是《决定性证据》；我存在过的决定性证据。不幸的是，这个短语暗

示了一个神秘故事，我就计划把英国版题为《说吧，摩涅莫绪涅⑤》，但被告知“小老太太们不会想要一本她们读不出书名的书。”我曾经玩味过《忍冬饰》，这是一种由精美的交错图案和展开的花簇组成的金银花装饰物的名字，但没有人喜欢它；于是我们最终决定了《说吧，记忆》（戈朗兹，1951，和纽约世界书局，1960）。它的译本是：俄文本，作者译（Drugie Berega，契诃夫出版社，纽约，1954），法文本，伊沃内·达维译（Autres Rivages，加利马尔，1961），意大利文本，布鲁诺·奥代拉译（Parla, Ricordo，蒙达道利，1962），西班牙文本，杰姆·皮涅罗·贡萨雷斯译（¡ Habla, Memoria!, 1963）和德文本，迪特·E·奇马尔译（罗沃尔特，1964）。这就是书目方面的全部必要信息，神经紧张，恼怒于《纳博科夫十二篇》书末的注解的批评家们将会，我希望，在本书的开头被催眠而认可它们。

在美国写作第一个译本的时候，我所遇到的障碍是几乎完全缺乏有关家族历史的资料，以及继之而来的，当我感到我的记忆可能有错时，不可能核对它们。我父亲的传记现在已经扩充和修订了。许多其它的修改和补充也已做过，尤其在较早的章节里。某些紧密的括号已被打开，从而能够满溢出它们仍旧富有活力的内容。或者，在叙述一个重要事件时仅仅作为一个随意选中而没有事实上的意义的模型的一件物品，每当我在修改各种版本的校样过程中重读那一段时，则总是给我制造麻烦，直到我最后尽了最大的努力，那独断的眼镜（摩涅莫绪涅肯定比其他人更需要它）蜕变成了记忆中清晰的牡蛎形烟盒，闪烁在 Chemin du Pendu⑥ 的一棵白杨树下的草丛中，在1907年那个6月的日子，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只在此遥远的西方难得一遇的天蛾，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我父亲在那里网住过一只在我们的北方林地罕见的孔雀蝴蝶。

1953年夏，在靠近亚利桑那州波特尔的一个农场里，在俄勒冈州阿什兰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在西部与中西部的各个汽车旅馆里，我设法在捉蝴蝶和写作《洛莉塔》与《普宁》之间，在我妻子的帮助下，把《说吧，记忆》译成俄文。由于对重新展开在我的Dar（《天赋》）中被精心制作的主题存有心理上的困难，我删去了整整一章（十一章）。另一方面，我修订了许多段落并试图对原作健忘的缺点有所动作——空白点，模糊的地带，微暗的范围。我发现有的时候，以高度专注的方法，中立的污斑可能会被迫使成为美丽的焦点，于是突然的景象就会被指认，无名的仆役就会得到名字。对于《说吧，记忆》眼前这个最后的版本，我不仅在最初的英语文本里引进了基本的改变和丰富的补充，而且利用了我在把它译成俄文时作出的修正。对俄国记忆的一次英语重述的一次俄语复归的这一英语的再现，首先被证明是一项恶魔般的工作，但是给予我某种安慰的是想到这样一种为蝴蝶所熟知的多次蜕变，以前还从没有任何人尝试过。

在一个记忆——它的拥有者和牺牲者绝不会试图成为一个自传作家——的反常事例中间，最糟糕的是在回溯中把我的年纪与这个世纪的年纪等同起来的倾向。这在本书最早的译本中已经导致了一系列具有惊人一致性的年代学错误。我生于1899年4月，自然，比如说，在1903年的三分之一时大约是三岁，但在这一年的8月，那显露给我的锋利的“3”（像在《完美的往昔》中描述的那样）指的将是这个世纪的年龄，而不是我的，我的是“4”，像一只橡皮枕头一样方正而富有弹性。同样，在1906年初夏——我开始搜集蝴蝶的那年夏天——我是七岁而不是在第六章灾难性的第二节中所说的六岁。摩涅莫绪涅，人们必须承认，已经表明自己是个十分粗心的姑娘。

所有的日期都以新法来计数：我们在19世纪落后于其它文明世界12天，在20世纪初则是13天。根据旧法，我生于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的4月10日，黎明，而在，比方说德国，那是（倘若我能被一下子带过边境）4月22日，但是因为我所有的生日都是以递减的盛况在20世纪庆祝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因革命及侨居而从儒略历变更到格里高利历时，通常都在4月10日上加上13而不是12天。错误是严重的。那会发生什么呢？我发现在我最近的护照里“出生日期”下面的“4月23日”，也是莎士比亚，我的侄子弗拉季米尔·希科爾斯基，雪利·邓波尔和哈塞尔·布朗（此外他还与我合用一份护照）的出生日期。于是，这就成了个难题。计算的笨拙阻止了我解决它的企图。

阔别了20年后，当我乘船回到欧洲时，我重新打起了甚至在我离开之前就已经解开的绳结。在这些家庭重聚中，《说吧，记忆》受到了判决。核查了日期与环境的细节，还发现了在许多事例里我弄错了，或是没有足够深入地检验一个模糊然而是可以彻底了解的回忆。某些材料被我的建议者作为传说或谣言删去了，或者，如果真实的话，这些事件与时期被证明为与脆弱的记忆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东两无关。我的表兄弟索尔吉·索吉维奇·纳博科夫给了我关于我家族历史的难以估价的知识。我的两个妹妹都生气地抗议我对贝阿里兹之行的描述（第七章开头）并以向我投掷具体细节来使我相信我将她们撇在后面（“和保姆阿姨们在一起！”）是错误的。我因为缺乏具体的文件证明而无法重新着手的东两，如今我更乐意为了彻底的真实而把它们删去。另一方面，有关祖先与别的显要人物的许多事实也显露了出来，并被编入《说吧，记忆》的这个最后改写本。我希望有一天写一本《说下去，记忆》，覆盖1940—1960年在美国度过的年月，某些挥发物的升华与某些金属的熔化仍然在我的线圈与坩锅里进行着。

读者将在本书中找到我的小说的分散的参考资料，但总而言之我感到写下它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它们应当保留在最初的胃口中。我最近为 Zashchita Luzhina, 1930 (《防守》，帕特南，1964)，Otchayanie, 1936 (《绝望》，●帕特南，1966)，Priglasenie sa kazn', 1938 (《斩首的邀请》，帕特南，1959)，Dar, 1952, 1937—38 连续出版 (《天赋》，帕特南，1963) 和 Soglyadatay, 1938 (《眼睛》，费德拉，1965) 的英译本写的引言对我在欧洲的往昔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提供了一个足够详尽、生动的叙述。对于那些喜欢要一份我的出版物更完全的名单的人，有一份详细书目，制作者是迪特·E·奇马尔 (Vladimir Nabokov Bibliographie des Gesamtwerks^⑤，罗沃尔特，第一版，1963，12；第二修订版，1964，5)。

最后一章中的两步棋由利普顿，马修斯和赖斯重新发表在《象棋难题》之中 (费伯，伦敦，1963，P252)。然而，我最有趣的发明是一个“白子后撤”问题，我把它献给 E. A 芝诺斯科-波若夫斯基，他在 1930 年代 (1934 年?) 将它发表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 Poslednie Novosti 上。我对棋子位置的记忆没有清晰到足以在这里把它记下来，但也许某个“fairy chess” (它也属于这类问题) 的爱好者有一天将在那些受到祝福的图书馆中的一家查阅它们，在那里旧报纸都被缩微摄制下来，我们所有的记忆也应当是那样。评论者阅读第一个译本比他们将要阅读这个新版本更粗心一些；^⑥他们中只有一位注意到我在第 2 部分第八章的第一段里“恶毒地咬”了弗洛伊德，而没有一个人发现一位大漫画家的名字以及第十一章第 2 部分最后一句里对他的赞美。一个作家最为尴尬的莫过于要自己来指出这样的东西了。

为了避免伤害生者或烦扰死者，某些正确的名字被改掉了。这些都在索引中由引号区分开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我的方便而

列出一些联系着我往昔岁月的人与主题。它的出现将恼怒粗俗者
但会满足眼光锐利者，如果仅仅因为

从那索引的窗口

攀上一枝玫瑰

而有时一阵轻风ex

Ponto^⑥吹来。

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

1966年1月5日

蒙特勒

注：①法语：“O小姐”。

②法语：《尺度》。

③Mnemosyne，记忆女神之名。

④法语：吊死者之路。

⑤德语：《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作品总目》。

⑥拉丁语：从船上。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的缝隙。尽管两者是相似的双胞胎，人，就像一条规则，看出生以前的深渊，比他（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下心跳）前往的那个更镇静一些。然而，我知道有一个年青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于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那里，也没有人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³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事情相反的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这样的幻想年青人并不陌生。或者，换一种说法，最初与最后的事物经常倾向于拥有一种青春期的特征——除非，有可能，

它们被一种可敬而坚强的宗教所指引。自然期望一个发育完全的人接受两个黑色的虚空，前面的与后面的，像他接受两者之间的奇异梦境一样若无其事。想像，永生者与不成熟者的至高乐趣，应当受到限制。为了享用生命，我们不当过多地享用它。

我反抗事物的这种状况。我感到了这一冲动，要把我的反抗释放出来，在自然的周围布下哨兵。一次又一次，我的头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辨认我的生命两端非个人的黑暗中最微弱的个人的闪光。黑暗仅仅是那道时间之墙造成的，它把我和我青肿的拳头，与一个没有时间的自由世界分隔开来，这是我乐于同浑身涂得俗丽之极的野蛮人共同拥有的一个信条。我曾在思想中返回——我返回时思想毫无希望地越来越窄——到遥远的地带，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出口，最终仅仅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路。除了自杀，我尝试了一切。我曾脱去我的身份，以便把自己当作一个司空见惯的幽灵，并潜入我出生之前即已存在的国度。我在心中忍受过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和退休中尉的自暴自弃的陪伴，他们记得前生曾经是罗马大道上的奴隶信使，或是拉萨柳树下的先知。我曾经翻乱了我陈旧的梦境，寻找钥匙和线团——我要同时说我彻底抛弃了弗洛伊德的粗俗，杂乱，根本上是中世纪的世界，它对性符号的古怪之极的寻觅（仿佛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培根式的离合字谜）和它嫉妒的小胚胎，在它们天然的藏身之所，窥视着它们父母的爱情生活。

最初，我没有觉察到，初看之下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是一个监狱。在探查我的童年（仅次于探查一个人的永恒）之际我看到意识的觉醒像一连串互相分隔的闪光，它们之间的间隔渐渐缩短，直到形成了感觉的大块光域，给予记忆一个湿滑的立足点。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多少是自发地学习数学和说话，然而我是我而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这一内心知识似乎是到以后，在他们的年龄和

我的年龄有关这一发现，与它直接联系起来时才得到了确立。当我想到那个启示，强烈的日光就立刻透过层层叠叠的翠绿图案侵入我有肺叶形日班的记忆，从这一点来判断，那一次也许就是我的生日，在残夏，在乡村，我曾经提问和估价我所得到的回答。这一切根据摘要重述的原理，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样；在我们最为遥远的祖先的头脑中自省意识的开端必定是与时间感的显露同时发生的。

就这样，当我自己的年龄刚刚揭开的，新鲜而整洁的方程式，4岁，与我父母的方程式，33岁与27岁，对应起来时，某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获得了一次极为鼓舞人心的震动。仿佛在接受第二次洗礼，在比15个月前一位吼叫的，淹得半死的半胜利者所举行的希腊正教洗礼（一种旧习俗吩咐我父母藏在门后，我母亲通过那扇半掩的门，设法纠正弄得一团糟的驼背长老，康斯坦丁·维特文尼茨基神父）更加神圣的仪式中，我感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种光辉而易变的介质，那正是纯粹的时间因素。一个人并非他自己，但是被时间的共同之流连成一体，生命共享——就像兴奋的沐浴者共享闪亮的大海——一个与空间世界截然不同的环境，不仅人而且猩猩和蝴蝶也能够感觉到它。在那一瞬间，我深深地察觉到，那抓住了我的右手，一身轻柔的白色与绯红色的27岁生命，就是我的母亲，而那抓着我的左手，一身坚硬的白色与金黄色的33岁生命，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并肩前行之际，我昂首阔步，又奔跑赶来，又再次昂首阔步，踏过一块块阳光的斑点，沿着一条小路的路心走下去。如今我轻易就将它与我们，在俄国以前的圣彼得堡省份的乡间地产维拉庄园中，一条有装饰性栎树的小径认同为一。事实上，从我遥远，孤单，几乎不曾居住过的时间在当今的界限，我看见我微小的自我，在1903年那个8月的日子庆祝感觉生命的诞生。倘若那握住

我左手的人和握住我右手的人在我模糊的童年世界中曾双双在场，他们是在一位隐姓埋名的照料者的面具下出现的，但此刻我父亲的军装，骑兵卫队辉煌夺目的制服，胸甲上光润的金色波涛在他的前胸和背脊燃烧，像太阳般呈现，而此后的两三年里，我一直对我父母的年龄保持着浓厚兴趣，并时时问到它，像一个紧张的乘客为了对一块新表而询问时间一样。

要注意到，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已服完了他的军事训练期兵役，因此我猜想那天他穿上他旧军团的装饰物是作为一个节日的玩笑。于是，我把我完全的意识的第一次闪烁归于一玩笑——这又有了重述的意味，因为大地上最先觉察到时间的生命也是最先微笑的生命。

2

在我4岁时所玩的游戏背后，是那座原始的山洞（而不是弗洛伊德派神秘主义者可能猜想的东西）。在维拉的一间客厅里，一张覆盖着印花棉布的长软椅，白底上有黑色的车轴草，它浮现在我的脑际，像历史开端之前地质巨变的某个庞大的产物。历史的开始（以美好的希腊的允诺）离这张长椅的一端不远，一株巨大的盆栽紫阳花灌木在那里，开着灰蓝色的花和一些绿色的花，在房间的一角半掩住了一尊大理石的狄安娜胸像的基座。在长凳倚靠着的墙上，历史的另一个阶段由乌木框中的一幅灰色浮雕所显示——一幅拿破仑战役的图画，在其中真正的敌手是偶然的和寓言式的，人们看见，全都聚集于同一块视觉平面的是，一个受伤的鼓手，一匹死马，战利品，一个士兵正要刺向另一个士